

09

嘉定文史

嘉定文史



选辑

(12)

政协上海市嘉定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嘉定文史

第十二辑

(内部资料)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嘉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6 年 10 月



▲李子文、孙文英伉俪与《“世界乐器之王”李子文》作者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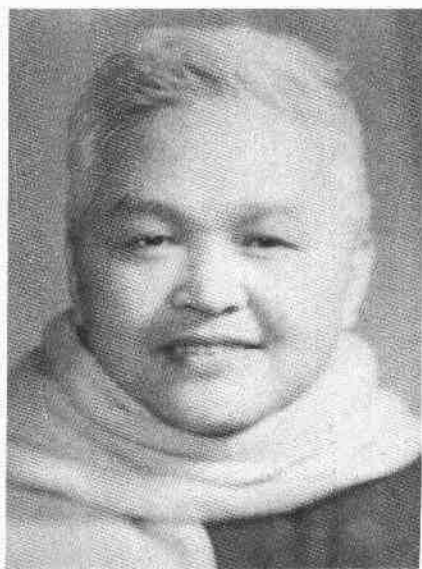


▲屡为外国元首掌勺的陆明肖像

◀ 马嵩山遗像



詹彪遗像 ▶



EC78/16
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特聘顾问

孙 镇

主 任

沈云娟

副主任

赵 杰 钱乃之

委 员

(姓氏笔划为序)

冯 淳	吕炳兴	沈云娟	张询祥	张昌革
陆慰萱	陈一凡	陈炳生	陈叔达	金 亶
周礼德	赵 杰	施心超	钱乃之	秦宝文
秦春祉	浦增铨			

编 审

童清仁 汤洪良

执行编辑

钱乃之 陈一凡

校 对

金 明

目 录

大事侧写

参加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稿》记	陆象贤	4
-----------------------------------	-----	---

风云撷片

唐鼎昌被捕始末	肖 银	19
智取敌特档案	肖 银	26
纪念嘉定解放 47 周年	金伏兴	30
八字桥惨案	陈浩文	35
徒手陷死日寇的周氏兄弟	印彩弟讲述 绳正记	37
在南翔红十字会义务服务	张服膺	38
一阕可歌可泣的壮士诗篇 ——十九路军朱耀章营长遗作	季 颖	40

人物春秋

可贵的金石交——纪念胡厥老百年诞辰	鲁 叟	42
念战友——陈楚平同志	芝 寅等	45
记中共嘉定县特别支部书记毛品章	毛齐华	51
永远的青年——忆马嵩山先生	邵 敏	55
怀念马嵩山同志	钱乃之	68
一个平凡而坚强的共产党员——詹彪	李中贤等	72
随仇县长搞血防的日日夜夜	叶德钊	78

李宝林同志在嘉定	张明泉	82
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	唐振常	89
“世界乐器之王”李子文	杨炳涛	93
张国梁与“鼎丰桂圆大王”	钱乃之	102
追忆高启华先生	徐品儒等	107
多产剧作家张幸之	陶继明等	112
季如松、陆麟勋与我	张服膺	120
屡为外国元首掌勺的陆明	施心超	126

地方史话

嘉定青年联谊社的片断回忆	金仲彦	130
记 1947 年秋至 1966 年夏的嘉一中	翟彦章	133
近百年来沪嘉之间交通演变	彭后宸	144
嘉定孔庙在“文革”中两次被冲击的经过	周其确	146
在嘉定举行的五届全运会第一个项目	陈兴顺	150
嘉定出土文物撮要	毛炯炯	154

艺苑拾零

钱坫与小篆	泮 人	158
书法家沈恩孚与浦泳	绳 正	159
南翔旧闻（八）	钱乃之	162

海峡两岸

蒋纬国与家父金定国（续）	金 璠	165
--------------------	-----	-----

古镇风情

嘉定三堂	肖克明	169
二、三十年代嘉定居民的服饰	绳 正	172
回忆童年时参加祠堂祭祖的情景	钱绳正	175
嘉定城中的三家酱园	泮 人	177
瞿城忆旧	仍 震	179
大年夜解混堂	殷志澄等	182

蹉跎岁月

《寓言四则》惹祸前后	陈炳生	184
------------------	-----	-----

旧闻琐记

双塘陈姓是陈友谅的后代	陈浩文	190
一代赃官七代贫	殷家伦	192

参加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记

陆象贤

1980年9月，我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第5期高中级干部轮训班学习，分在二部（理论部）共有学员596人，其中来自新疆的53人、其他省市的347人、国务院各部委和中央直属机关的147人、军队的49人。学员中60岁以上的有203人，当年我63岁，已是一个白头生员。当时的校长是华国锋（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动工作）、副校长胡耀邦、冯文彬，教育长是宋振庭。

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进党校学习，而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学习过程中，强调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要认真考虑极“左”思想的具体表现。胡耀邦同志对我们说了4个“好好地”，一要好好地读一点书，工作了几十年，没有时间读书，要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二部规定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有38万字，加上参考部分的书，大约要读100万字），二要好好地开动机器，思考一些问题，三要好好地总结一下31年来的经验，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党性上、作风上有明显的进步、提高，好好地重新工作。轮训班还规定在重大问题上允许展开争论，允许有不同意见。始终坚持四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

子，不装档案袋子。创造畅所欲言的民主的学习风气，加强团结，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正当我们认真读书的时候，10月15日，宋振庭同志主持召开学员大会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要我们立即集中一段时间参加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这是我们这一期轮训班学习的非常难得的机会。当时全党有5000人参加讨论，其中有中央党、政、军机关1000人，全国地方党、政、军机关3000人，加上中央党校1000人。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份决议稿，要在10月16日至23日讨论完毕，每个小组修改出一份，10月底将中央党校的修改稿上报中央。在这一个星期中，前3天认真阅读文件，后4天讨论修改决议稿。对讨论的要求：一、表态少讲，要用明确的文字、语言对某页某句表示赞成、反对、修改、补充，不多讲情况和个人遭遇，要全部精力用于修改上。二、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任何人不能阻止。对党负责，不怕讲错。同时宣布了对决议稿的4条保密纪律：一不准抄存，二不准携回家，三不准外传，四不准对外透风。如有违反保密纪律，一律受党纪处分。讨论完毕，收回决议稿。

党校将讨论决议稿的情况，印发《简报》，对有重大修改意见，印发《快报》。在党校的机要阅览室内还可看到中央和全国各地的《简报》。我由于工作关系还可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了解以胡乔木同志为首的起草小组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决议稿的意见。

我所在的二部六支部一共41人，来自浙江省、国务院一机部、全国总工会和军事学院等，分成4个小组。我的任务是整理出小组的修改稿。工作确实很紧张，收获也很丰

富，在全党 5000 人讨论以后，我继续保持与中央党史研究室联系，了解了决议稿的几次重大修改的过程。经过这次学习，使我对党史的理解，受益很大。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我们只能在历史形成的条件制约下创造历史，如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于世已经 13 年，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现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统一和高度团结，正在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到邓小平同志总设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并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 13 年前讨论决议稿的状况，这对于学习、理解决议，汲取历史经验，做好当前改革开放工作，展望前进的道路，不无裨益。

全党 5000 人讨论的决议稿是第二稿，分 5 部分，没有小标题，第一部分是建国 31 年来历史的重要意义、成就和错误。第二部分写了 31 年，分为 4 个阶段。一、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二、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 10 年。三、“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四、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第三部分写“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第四部分写毛泽东思想。第五部分写我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决议稿是用论文形式写的。这个决议稿经过全党 5000 人讨论后，又经过 1981 年 3 月 31 日中央向 52 位老同志征求意见；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 5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5 人讨论后，改动很大。

在几次讨论中，争论大的问题有：第一个是社会主义改

造是否抢早了？中国是不是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胡乔木同志在1981年4月16日起草小组的讨论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毛主席在1955年针对李烛尘提出早点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意见时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人为地加速，一定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胡乔木同志还说：“周而复同志写的《上海的早晨》出了3部了，它就是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前两部我看了，我认为它是反映历史的真实的。从《上海的早晨》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毛主席的急躁冒进冒出来的，它是快的，但不是人为的加速，不是人为的跳过了好端端的国家资本主义。”他针对当时有人引用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和其他一些讲话中的一些话，革命胜利以前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所以革命胜利以后说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话，说是前后矛盾，以此说明我们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错了，甚至说我们搞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列宁讲的不一样，说列宁讲的是全民的统计和监督，而我们搞的则不是这样。胡乔木同志回答说：“怎么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给每个人嘛！所以这种看法不对的。”他还说：“我们也不能够只根据毛主席是怎样说的，而后来又是怎么做的，随便作出判断，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应该怎样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但是我們不应因此而诅咒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有些文艺作品就是这样做的。”对中国是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胡乔木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党多年来的一贯主张，近年有的同志提出异议，而党外有些人（好人坏人都有）也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应补

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谬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在对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他们都援引马克思或列宁的话，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总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还是初步）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有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从简报中几乎都是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的态度，在中央党校的简报中只有一个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说了几句好话，当时我很反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讨论中普遍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种种疑问。胡乔木同志早在1980年3月15日就在起草小组里说：“历史问题决议稿有两个难题：一是‘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不讲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错误，那末也就得不出教训，这个决议写出来也就没有用；二是阐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我们要坚持什么，要归纳出一些内容来。”他谈这两个难题的话较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呢？首先，最重要的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我们党是在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这句话是毛主席说过的，这本来是优点。但是，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如果还采取这个办法，这就把优点变成了缺点。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的报告里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毛主席在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里，也说过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的观点。可是，很快当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又认为抓阶级斗争很重要，特别

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候是很激烈的。是6月份说的话。1958年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后，讲到集中力量搞技术革命，可是讲了一次不再讲了，到庐山会议强调党内的阶级斗争。以后发展到1962年，党的十中全会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斗争，后来又提出走资派，这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错误。“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这个产物。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包括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左”的倾向。从解放初期就要批《清宫秘史》没有批起来，后来批《武训传》批起来了。如果批一个戏是可以的，可是把批一个戏、一个剧本、一个电影搞成全党的政治运动，这是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见的怪现象。到了1980年6、7月间，胡乔木同志发挥这个观点，他看了一些材料，认为不能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有他的理论。他的理想是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倾空想的乌托邦。1958年设想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先验的空想。毛主席说到供给制，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讲话中，郑重其事地提出来了。他说：我们中国发展了列宁的辩证法，就是要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我本来不要搞工资制，可是有的人说我是农村作风。当时他讲了以后，柯庆施马上打电话给张春桥，要张春桥写文章，张春桥写出来了，要求实行供给制，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批示基本正确，因为文章反映了他的观点。后来，大家算帐，实行供给制，全国财政开支要多少，觉得行不通。如果要实行供给制，财政开支比工资开支还要大。把“五七”指示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也是一个空想。1974年12月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是毛主席同周总理谈话时说的，就是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要

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他老人家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很不满，下决心要取消。1976年讲我们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因为他是空想，不能实现的，所以不能得到党内大多数的支持。如果说，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家都跟着错的话，这些空想大家怎么也跟不上。他自己感觉到，他的理想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认为自己是属于少数，他逐渐感觉到其他人走人歧途，不懂马列主义，走向修正主义道路，都成了走资派，都要把他们打倒。搞阶级斗争，打倒走资派，这是第二个原因。再一个原因，是社会历史条件。中国落后，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它的影响深入到各个阶级。落后表现的另一方面，就是小资产阶级很多，农民象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党，影响着我们党，也影响党的领袖。照我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也要实现一种他认为是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平均的思想。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这样来消灭一切社会差别，这是“左”懂空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健全的理论的影响，包括列宁的建党学说，国家理论。列宁的建党思想，就是在《怎么办》里的思想，说在沙皇统治下的秘密的党要高度集中，他把集中的党的理论推广到全世界，各国的党都要照他的样子办，而且运用到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上去，都要听共产国际的指挥。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是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作了坚决斗争，这样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斯大林错误地估计解放战争初期的国际和中国的形势，警告中共如果同蒋介石打，中华民族就要葬送。“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反驳说：‘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

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这几句话就是指斯大林说的。但是，毛主席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说了算，自己却又继承了。所以，不能说封建呀，家长制呀，还有国际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到民主制是要消亡的，因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制度。既然国家要消亡，也就是民主制度要消亡。胡乔木同志说：“我不相信民主制度要消亡，一个社会要组织起来，他必须有一种制度，民主制度怎么可以消亡呢？我也不认为国家会消亡，这是一种幻想。国家、政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马列主义讲到国家，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讲的就是镇压，就是专政、独裁。所以，毛主席强调镇压，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恐怕还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要强化国家机器的说法是错的，胡乔木同志回答：国家机器对外是要强化的，以防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公安机关也不能说现在就不要强化了，间谍战是在发展，我们已经落后了。就是友好国家，现在也对我们进行很厉害的间谍活动，不仅是刺探情报，也不仅是收买高干子女，比这个还要超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在《决议》中如何写，要写得概括。邓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意见，他说：“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3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如何写。再一层是与1945年党

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比较而言的，所以说：“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

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 10 年之久的原因，写了两条。邓力群同志在 1981 年 6 月 12 日汇报时，建议参看恩格斯于 1890 年 9 月 21 日—22 日在伦敦写的致约·布洛赫的信。恩格斯在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来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8 页）。我学习了恩格斯的这段话，从理论上理解了决议所写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 10 年之久，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深刻含意。

胡乔木同志还讲过这样一件事。夏衍同志给他写信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后来，据了解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批评刘少奇同志的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没有自己承担责任。胡乔木同志在复信中回答：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是在 1954 年写过一段自我批评的话，毛主席看了这段话以后，没有讲这句话他自己先讲的。我了解的决不是他自己记得却不承认，原因是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后，病了半年，身体很不好，有一些事也忘了。